

SUNZHONGSHAN ZHENGZHI SIXIANG YANJIU

王德昭 著

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3.0
4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SUNZHONGSHAN ZHENGZHI SIXIANG YANJIU

王德昭 著

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王德昭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12

ISBN 978 - 7 - 101 - 08452 - 8

I. 孙… II. 王… III. 孙中山(1866~1925)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D69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0563 号

© 2011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本书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授权简体版,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图字: 01 - 2012 - 1565

-
- 书 名 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著 者 王德昭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1}{2}$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452 - 8
定 价 28.00 元
-

导 读

学术著作，有风行一时，渐因时代迁移而受淘汰，永失其价值者；有因研究扎实，根深叶茂，立论严谨而有不易的卓见，历久常新，可传之久远者。先师王德昭教授旧著《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原名《国父革命思想研究》，一九六二年在台湾由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当属后者。

近日发兴比较孙中山先生与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urk, 1881—1938)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功业，重读了王师该著作。王师该书在学期间，或日后做研究工作，已读过不知多少遍。近二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孙中山研究”一直是热门课题，出版过的著作和论文千百计，其中不乏推陈出新的研究成果。今次重读王师该著作，仍感其研究进路，独树一帜，为当今孙中山研究所阙。书中胜义纷陈，于我启发仍多，有后撰者不可取代的参考价值。该种感受，谙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的海外学者，屡有同感。

王师该著作的最初出版，囿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艰和书业运作的落后，本就流通不广，只传读于当时的孙中山研究者之间。初版也早绝迹于书市，后之研读者实无法得睹。八十年代中文图书出版突飞猛进，而王师已归道山，亦无从修定以应学术文化界的需要。今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将引动研究者的关心与读者的兴趣。相信王师久已绝版的该书如能重新出版以广流播，将大有益于对孙中山思想和辛

亥革命的认识。故此推荐给香港商务印书馆,再推荐给北京中华书局,并请得高寿而寓居于美国的师母王陈琬女士的同意,重排出版。

《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其撰作之缘起以至出版过程,王师《自序》中已有言及,此处不赘。此书结构如目录所示,由两篇长论文组成。一是《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一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前者是研究分析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后者是研究分析孙中山思想形成后的思想系统和特点。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足。全面揭示了孙中山思想的中外来源、发展过程、内容要点、理论系统、时代特征以至实行的成效等,是一本研究孙中山革命思想体大思精之作。

牟润孙师在悼亡德昭师文中,曾道及德昭师为学特点,说他“中西史学兼通,既擅长西洋史更能讲近代史,讲中西交通史与史学方法论尤为出色……他治学不故为新奇之论,更不以异说哗众取宠,平正而翔实,颇为难得”(见《海遗丛稿·悼亡友王德昭》,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九年)。牟师所说,切中肯綮,知人知言。《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充分表现了德昭师的治学所长和治学特色了。

孙中山一生,手不释卷,博览中外古今群书,撷取革命和治国思想精华而融会贯通之。孙中山先生成长和革命活动踪迹遍及中外各地,默察时世,体察人情,有实际的体验。孙中山先生一身而预大小实际革命的组织 and 策划,理论与实践并重。所以创就了他自成系统、成一家之言并孚时用的革命和建国思想。要将孙中山思想组成,追本溯源,发展脉络,逻辑理路,以及照应时势所作的取舍,作草蛇灰线的疏理,谈何容易。非兼通古今中外思想学说,谙于近代中外历史形势和史实,掌握有关孙中山行事的大量史料,予以疏理而不为功。近代孙中山研究者能具备

如此种种条件者，德昭师足矣，所以能成就此体大思精、鞭辟入里之作。

际此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与德昭师去世三十年的时候，能重排出版《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俾流通士林，广益孙中山先生和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公器私谊兼得，故不揣浅陋，略作导读说明。

陈万雄

自序

本书所收的两篇论文是作者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暨俄国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之约,得其资助,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间撰成。承该所梅谷博士(Dr. Franz Michael)函知作者有自由予以发表之权,承张晓峰先生允为印行,都令作者感激不尽。

这两篇论文所用的资料,大部分得自现在台湾南投草屯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史库。该会典藏处同仁,在张处长大军和李专门委员振宽的领导下,不辞辛劳,协助会外人士进行研究工作,其精神令人敬佩。至于这两篇论文的主旨,作者不自量力,试图就民元前后的政治、社会与时代思潮的背景,以分析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构成、其合理性及其有效性。这是一项纯客观的分析剖述的工作。但作者不揣浅陋,仍窃愿于中山先生遗教的阐扬,能有微末的贡献。

王德昭

一九六二年三月

台湾师范大学,台北

目 录

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	1
(一)·····	1
(二)·····	3
(三)·····	18
(四)·····	34
(五)·····	49
(六)·····	56
(七)·····	69
(八)·····	89
(九)·····	110
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	117
(一)·····	117
(二)·····	137
(三)·····	154
(四)·····	171
(五)·····	201
(六)·····	225
(七)·····	248

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生革命 思想的分析研究

(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

(一)

同盟会时期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大成的时期，也是他开始具有信念，相信革命的大业可以及其身而成的时期^①。在这时期中，他发表了三民主义学说的纲领，开始讨论五权宪法，并拟具了一个层次井然的革命进行的程序，以后习称“革命方略”^②。

① 《孙文学说》，《国父全集》(二)，页八八。一九五七年改版，台北。《孙文学说》于一九一九年始在上海印行；有自序，一九一八年撰。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二十七章《革命方略》，载《军政府宣言》等文告规程十三件。章首说明《革命方略》的由来称，《革命方略》，乃“丙午年(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东京同盟会本部所编制，为一种之油印品。……及中山自日本赴越南，革命军之大本营遂移于东京河内，同时复将原稿重行修订焉。……兹编所载，即河内机关部所修订之油印品也，照录全文如左”〔冯书(一)，页二一三。一九五四年，台北〕。内《军政府宣言》定革命建国的“措施之序”为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冯书(一)，页二一六；《国父全集》(四)，页六〇—六一〕。但中山先生屡称他制订“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的时期为(一)军政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二)训政时期，“在此时期

中山先生的言论,属于同盟会时期以前的,传世不多^①。但就现存可见的如《上李鸿章书》^②、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

内施行约法”;(三)宪政时期,“在此时期始施行宪法”〔《孙文学说》,《国父全集》(二),页五四—五五〕。其他革命党人的记载,如胡汉民自传,亦称同盟会时期“先生更为《革命方略》,以授党人,大旨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革命文献》(三),总页三九二。一九五三年,台北〕。因此,中山先生学说中的“革命方略”,在一般应用上,每专指他的革命建国三时期的主张,本文亦同此。

- ① 同盟会时期以前的中山先生言论,其传世之稀,于下引吴稚暉的话可见。在致邵飘萍的一封信中,吴说:“中山先生的遗著,最近二十年来所存的,自然大家都看见。惟有他早年的言论,止有他的自传里讲了一点,也还是他到了晚年的回忆的,并没有长篇大论,确然是当时写出的。现在幸亏有顾颉刚先生,得了陈援庵先生的指告,才在甲午年(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九月和十月的万国公报上,录了一篇上给李鸿章的信,介绍到十九期的语丝杂志。这真是一个古董。”(《吴稚暉言行录》,页一三三。一九二九年,上海。此致邵飘萍书撰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山先生逝世后半月)
- ② 关于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的发现经过,已见上注。关于此书的撰成经过,则颇有异说。据陈少白说,此书在中山先生草成后,曾经陈自己和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修正(见《兴中会革命史要》,页七一八。一九五六年台版,台北)。因为中山先生与王韬相识是在郑官应的上海家,郑是《盛世危言》的著者,似乎其中应该也有郑参加的成分。另据罗家伦说,“据胡汝麟(字石青,河南人,旧国会议员,虽与梁任公方面接近,但其人颇读书,人品颇好,不妄语)告郭廷以……云,总理《上李鸿章书》,系麦孟华所草拟,总理与麦相稔,此系徐勤告胡者”(罗氏毛笔原件,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存)。惟此书系以孙文署名发表,西字报迟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即已道及此书(见 Bernard Martin 著 *Strange Vigour: A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P. 53, 引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三日香港 China Mail 语。Bernard Martin 书,一九四四

中的记载^①和兴中会的宣言^②等视之,与同盟会时期都还有前后相承的条理可寻。

(二)

讨论同盟会时期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最适当的年代的断限,应该是起自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这一年中山先生开始以以后同盟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

年,伦敦出版),而书中所见的思想,与同盟会时期中山先生的言论都还有前后相承的条理可寻,所以本文仍视此书为中山先生著作的一部分。与此问题有关者,尚有《盛世危言》各篇文字的撰人问题。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上海《国民日报》论《盛世危言》,即称:“按《盛世危言》一书,为皖人吴汉涛所撰。吴昔与孙逸仙交,其书半皆成于孙。后吴应郑(官应)之请,故执其说以售之,获多金。”(《国民日报汇编》第三集,“社说”,“近四十年世风之变迁”,页三四。光绪三十年,上海)此不知何据。惟《盛世危言》自序和内容的《农功》一篇,其思想文字,多与《上李鸿章书》相似。参看胡秋原撰《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一文(《三民主义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一号,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重庆)。胡氏并试作解释,谓“鄙意先生(中山)与郑氏年龄相差,至少有二十余岁,然同县(香山),且为同具新思想之人,必先生甲午去国前过从甚密,有讨论之雅,有文字之交”云。

- ①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有中山先生壬寅年序,宫崎明治三十五年自序。按日本明治三十五年,岁次壬寅,应即是此书撰成之年,时在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又宫崎记与中山先生谈话,中山先生为他道革命的宗旨与方法,乃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后次年经美洲返抵日本之年,岁次丁酉,即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
- ② 兴中会宣言有二:一为甲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一为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香港兴中会宣言〔《国父全集》(四),页五五一五九〕。

民国,平均地权”——来吸收革命党员;而止于辛亥(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这一年武昌起义,中山先生自美国经欧洲返华,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惠州之役失败的当年,兴中会的一个首领杨衢云在香港被害。次年,又一个首领郑士良病故。至此,兴中会实际殆已陷于停顿的状态^①。庚子以后,中山先生已极少为兴中会收揽党员;而尤可注意的,自庚子以后的几年,中山先生在日本结识的中国留学界人士,他都未劝使加入兴中会^②。癸卯,他曾应胡毅生等人之请,在东京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团体^③;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他由美去欧,在留欧的中国学生中组织革命团体^④,都未用兴中会

-
- ① 参看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及(庚子)八九月间,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等,在惠州、广州相继失败,衢云且被清吏派人暗杀,兴中会元气大伤,党务殆陷于完全停顿。只余中国日报尚能发挥正论,且向满廷及保皇党作坚苦之奋斗而已。”〔《革命逸史》(四),页十。一九四六年,上海〕
 - ② 参看冯自由《革命逸史》(三):“孙总理尝为余言,兴中会自惠州一役失败后,极少收揽党员,只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冬在安南河内收得黄隆生、罗鐔、杨寿彭数人,及癸卯、甲辰两年间在檀岛、旧金山收得曾长福、黎协、邝华汰等二十余人云。故总理于庚子九月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秋,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革命逸史》(三),页三二。一九四七年三版,上海〕又张继《忆革命初期的几位青年同志》,所述亦同。见重庆《中央日报》载张继谈话,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 ③ 胡毅生《同盟会成立前二三事之回忆》,《革命文献》(二),总页二四七—二四九。一九五三年,台北。
 - ④ 朱和和《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二),总页二五五—二六〇。

名义。而反之,这两种团体,乃至癸卯他在檀香山以兴中会名义收得的革命党员曾长福、黎协等人,所用的誓词都已是其后同盟会的誓词^①。甲辰(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他去美,倡议洪门会员总注册,并手订“致公堂新章”,其所揭的宗旨也与同盟会誓词的文字全同^②。

惠州举兵,后于戊戌(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康、梁的变法运动二年,后于康、梁在日本组保皇会(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一年。这次举兵的失败,可说兴中会以会党为主力起事的最后试验的失败。从庚子到癸卯的四年间,革命运动的国内外环境,有两个显著的变化:第一是兴中会从甲午(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以来在会党和海外华侨社会的基础,几乎十九被保皇党所夺;第二是这几年国内外中国知识青年对于政治运动的热中。就前者言,中山先生自己承认,在他经过从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初败至庚子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的五年后,适有保皇党发生,“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③。在日本,兴中会的根据地是横滨。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戊戌间康有为的弟子徐勤等至横滨办大同学校,最先向横滨华侨社会为之先容的,也是兴中会会员陈少白^④。但徐勤至日本年余,而横滨的孙、康两党,“已渐成反客为主之局”。及至戊戌事变起后,康、梁师徒亡命日本,梁启超在横滨发刊《清议报》,倡勤王之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横滨保皇会成立,

① 见上页注③、注④。又《孙公中山在檀事略》,原载一九二九年檀香山《自由新报》特刊《檀山华侨》,收入《革命文献》(三),总页二七八—二八四。

② 《手订致公堂新章》,《国父全集》(六),页二三五。

③ 《孙文学说》,《国父全集》(二),页八五。

④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页二三—二六。

侨商中的兴中会会员,更泰半加入保皇党^①。在庚子兴中会惠州举兵的当年,在长江一带便先有唐才常和秦力山等人主其事的自立军之役,假勤王名义,受保皇会的经济接济,而所用的会党基础也即是毕永年为兴中会所招致的长江哥老会头目^②。在日本和内地保皇会的侵夺兴中会地盘者如此,在兴中会的发祥地檀香山亦然。梁启超在己亥年终去檀香山,因中山先生的介绍与旧兴中会会员交游,于是立保皇会,而“檀岛兴中会会员也多为保皇会所用,与横滨兴中会会员如出一辙”^③。梁启超当日致书康有为,报告檀岛保皇会事,便曾自称“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又称,“此间人无论其入兴中会与否,亦皆与中山有交”^④。而保皇会仍能使檀岛华侨入会,至于“十人而七”^⑤。至于南洋,则保皇会势力的进入,尚在革命党之先。

庚子后兴中会意态的萧条,可以从更多当时人的记述中见之。章炳麟自称他在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春天到日本,见到中山先生。但“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两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⑥。宋教仁《记程家桎事略》,也说程当时去日本,访中山先生,初意“孙文革命首魁,所党必众”,岂料“所谓兴中会,以康有为之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文惟借张能之、温秉臣、尤列、廖翼朋者数人,设中和堂于横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页四一一—四二。

② 同上,页六八。

③ 同上,页四八。

④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一二四引。一九五八年,台北。

⑤ 同上。

⑥ 《演说辞》,《民报》六期。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日本东京。

滨,其势甚微”。并说当时“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①。兴中会原来的基础既为保皇会所夺,则革命的进行,除非夺回旧基础,便须另造一新的基础。张继在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居日本,由秦力山带领至横滨谒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没有劝他和同去的人等入兴中会,据张的解释,大概中山先生“那时已经在计画着把这以会党为中心的兴中会,改组为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同盟会”^②。

中山先生尝自称,“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中人耳”^③。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运动与会党关系的密切,自不待言。在同盟会成立前二年(即癸卯),中山先生为便于在海外号召,并与美洲的保皇会势力斗争,曾在檀香山亲身加入洪门^④。次

① 程家桢《革命事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藏初印本,页一(下)一二(上)。书后有民国二年一月张继《跋》。

② 张继《忆革命初期的几位青年同志》。

③ 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三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讲演(别一记录)。《国父全集》(三),页六。

④ 中山先生入洪门之年,说者不一。有说在甲辰,有说在乙巳以后,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九三八年,长沙),页三一—三二。本文据国父年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一九五八年,台北),页一二七—一二八,从陆丹林说。按梁启超于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岁末去檀香山,次年即加入洪门,是其加入洪门尚早中山先生三年。在庚子二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三日)梁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报告他在檀香山加入三合会的经过,说:“檀山之人,此会居十之六七。初时日日演说,听者虽多,虽欢迎,然入会者寥寥。后入彼会,被推为其魁,然后相继而入。……弟子今日能调动檀山彼会之全体,使皆听号令。”〔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一〇二〕

年,中山先生去美洲,倡议洪门会员总注册,并手订《致公堂新章》。《新章》的纲领第二条宗旨,与其后同盟会的誓词文字全同,已如上述。而其纲领第四条,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作益友,互相提携”^①,也与其后《同盟会总章》的第五条,在精神和文字上声气相应。后者称,“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颐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②。迨辛亥年,中山先生再去美国,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因赴旧金山,组织洪门筹饷局,以备再举。当时同盟会和致公堂并曾登报布告,由致公总堂开特别会,招纳同盟会会员之未加入洪门者,全体入会^③。在致公总堂的布告中,并明言“孙文大哥……倡议与同盟会联合,结大团体,匡扶革命事业”^④。至于同盟会时期历次在国内的武装起义,下层自然仍都有会党的成分参加^⑤。但如一位同盟会的日本同志萱野长知所说,会党中人,“起事时求其响应固可,而欲用以为主力则不可”^⑥,

① 《国父全集》(六),页二三五。

② 《中国同盟会总章》,丙午(一九〇六)改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藏钞件,邓慕韩据陈少白藏油印原件钞得。

③ 黄福銓《华侨与中国革命》,页一〇七—一〇九。一九五五年,香港。

④ 同上,页一〇八。

⑤ 参看曾杰《洪门事实与民族生存》,《洪门对于国民革命的贡献》。无出版时地名,卷末附记“二二(年)、六(月)一(日),曾杰伯兴于上海”。

⑥ 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页六一。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东京。然中山先生亦尝云,“彼众(会党中人)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孙文学说》,《国父全集》(二),页八五〕是萱野所说,殆即译中山先生语。惟萱野于辛亥前同盟会起义诸役,多曾身预其事,对于革命经过情形,应知之甚稔。

因为他们知识浅薄,团体散漫。革命所得自海外华侨的效力,在势只能以经济的接济为主;至于国内会党之直接参加起义,其效果亦殊有限。

在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的知识人士间,对于革命事业运用会党的问题,似曾有过一度辩论。最可注意的证据之一,是陈天华的《绝命书》,载《民报》二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一九〇六年一月)^①。这是当时人当时的意见的表达。他说:“会党可以偏用,而不可恃为本营。日俄不能用马贼交战,光武不能用铜马、赤眉平定天下,况欲用今日之会党以成大事乎?”^②其次是朱和中的追记欧洲同盟会事实。据称,当中山先生在乙未年到欧洲,进行成立革命组织时,朱曾向中山先生力陈,“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革命)骨干”;又说,“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果成功,反为所制”^③。此外如张继也说,会党同志,“往往今天找来,明天就变节了,因为他们还不能明白认识革命的意义”^④。对于革命党人,长江哥老会头目在己亥年(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方与兴中会在香港结盟,而庚子年便因保皇会多资,弃兴中会而投唐才常^⑤,自然是一个明白的教训。但便是保皇党方面,对于在直接行动中大用会党一层,也自始表示怀疑。庚子年,唐才常

① 著者所见《民报》二期,封面之初版发行日期为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然此系第一期之初版发行日期。本文从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一文所记,定为一九〇六年一月。《革命文献》(二),总页二三一。

②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民报》二期,文页四。

③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二),总页二五六。

④ 张继《五十年历史之研究与回顾》,《张溥泉先生全集》,页二四。一九五一年,台北。

⑤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页六八。